

编者按:

4月20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办的“北大赛瑟论坛·2016(第十三届)”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迈进‘十三五’——新发展理念与全面小康”。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执行副总裁王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CCISSR主任孙祁祥分别做了主题演讲。论坛由北大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秘书长郑伟主持。本版内容为5位嘉宾演讲摘要。

# 新发展理念与全面小康

## ——第十三届北大赛瑟论坛嘉宾发言摘要



蔡昉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突破“穆勒两难”的约束

任何时候事物都有对立面。在社保问题中,一面是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另一面是任何的社会救助政策都会导致依赖性,而这个依赖性会破坏市场激励,降低劳动参与率。历史上这两种观点曾经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被放在一起讨论,我把这个问题叫做“穆勒两难”。从国际经验看,我们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下来了,这是任何政策设计的最基本的前提。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第一,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企业竞争力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人力资本不再是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必然发生。第四,由于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少,这也意味着劳动力进城的速度大大下降,资源配置效率会大大弱化,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就会减慢。

到“十三五”期间,我们预计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下降到6.2%左右,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供给侧的原因,为什么要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以保持经济增长。

在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逐渐消失的时候,更根本、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于要转换到新的增长源泉,我们现在叫创新发展,而创新发展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过去30年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

农业是个劳动力过剩,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如果将过剩的资源吸引出来,投入到生产率更高的产业中,我们就得到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个效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最主要的构成。三大产业之间是大量的资源重新配置,不同的行业之间还可以重新配置资源。这就意味着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资源应该由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来接管。这就叫做“创造性破坏”。具体来说,就是要能够让想进入的企业没有壁垒,要让该退出的企业退出,该死亡的就死亡,不能像僵尸一样存在,这样可以发动新一轮资源重新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进行“创造性破坏”时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剩余产能可以被破坏,没有效率的僵尸企业可以被破坏,甚至不再有竞争力的岗位、技能也可以被破坏,但是劳动者必须加以保护。这个时候,不要让产业政策解决人的问题,要让社会政策托底和“创造性破坏”之间的关系。

“穆勒两难”在中国当前特定的情况下,是我们面临的要解决的问题,是具有针对性的,同时也有意义。我们在研究社会保障问题的时候,应该把“穆勒两难”作为一个考虑的问题,论证研究目标、模式。“穆勒两难”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设计政策目标和模式时,我们只有能够讨论约束条件,提出解决约束条件的办法,这才算是走出了书斋,提出了面对真实世界的政策建议。我希望大家能够将自己最好的研究心得、制度设计提出来,同时也能让这个设计更加有利于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打破传统的约束条件、打破所谓的穆勒悖论。

###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衡量经济触不触底看3个指标

“十三五”时期,我们有许多历史任务



刘世锦

需要完成,比如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两个翻番等等。但是从历史过程来讲,更重要的是实现经济转型。要做好不容易,除了供给侧方面的原因,还要强调长期需求的问题。假设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不变,人口结构也不变,那么高速增长是不是就一直持续下去呢?其实也不是,到某个点还是要下滑。这实际上是技术条件给定情况下长期需求约束的结果。当然,技术属于供给,从这个角度讲也是供给的因素。技术和长期需求是一对互补的变量,我这里想强调的是长期需求。

大家常说,我国经济增速目前还处在下降的通道。我们的基本判断是,这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或中速增长的过程,是基本符合转型规律的。

从需求侧看,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带动的,而投资又基本上由出口、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构成。近几年来,这几大需求都在调整。从供给侧讲,调整情况比较复杂,虽然也在调整,但速度比较慢。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通过多放流动性,把需求提上去。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观点,中国当前供求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重点需求接近或达到长期峰值,供给侧调整跟不上。第二种是去产能,从供给侧来看,只有去掉剩余的产能,价格才会回升。所以,衡量经济是不是触底,主要看3个指标,需求侧主要看投资、供给侧主要看PPI和工业企业利润。

上述3个指标,今年一季度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至6%左右,有提升;PPI是-4.3%,跌幅继续收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也由负转正。这些变化的可持续性值得观察。从典型追赶型经济体发展的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将来可能还会再下一个台阶,处于中速的增长期,比我们的高速增长要低一点,但高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实际上依然处在追赶期,不过追赶的性质变了,过去是数量追赶,今后是质量追赶。

要是实现质量追赶,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是校正资源的错配,现在资源错配情况还是比较突出的。其次要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创新发展,实现质量追赶,对劳动力素质要求很高,需要提升人力资本。这就涉及社保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人口流动性等问题。因此,这一阶段,保险业的发展面临重大机遇,发展肯定会比较快,需要承担的使命也比过去更为丰富。

###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 对我国社保体系建设有充分的自信

过去5年,我国社保体系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人民群众从中受益,有真切的获得感,这是事实。比起5年前,10年前,我国社保制度更加完备,覆盖范围更广,保障水平更高,资金实力更加雄厚,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的底气更足,继续完善社保体系的基础更加稳固,这也是事实。基于这两点事实,我们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历史和未来,应当有充分的自信。

围绕本届论坛“迈进‘十三五’——新发展理念与全面小康”为主题,集中谈“十三五”期间社保制度创新问题,讲3个观点。

第一,社保创新要立足现实基础。我国社保制度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算起,已有60多年历史,上世纪末以来又进行了20多年改革,无论怎样评判,它都是现实存在,我们不可能摆脱这样的路径依赖和条件约束。通常,理论研究者更倾向于颠覆旧制度,重构新体系,描绘美好蓝图;实务工作者更精于计算转制成本,更关注政策的连续性、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和社会的稳定性。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将二者结合起来,



胡晓义

既追求理想,又顾及现实。但此话说易行难,例如前一段时间热议的职工退休医保缴费。如果是在白纸上作画,这未尝不是一种政策选项,但毕竟自1998年以来退休不缴费已经成为职工的既有福利,即使真有必要调整,从专业工作的经验和角度看,也需要周密设计过渡性、衔接性、替代性的措施,比如哪些人缴费、哪些人不需缴(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以定额缴费来锁定特定群体的经济负担,用开展门诊统筹减轻一定门诊费用支出来替代缴费的利益损失等。如果有这样的平衡考量,可能实际效果和社会反响会好一些,这只是个具体事例。其实许多改革创新都面临这类选择。所谓创新,大都是在理想与现实两难、多难选择中探索可行路径。

第二,社保创新要动员公众广泛参与。一般地讲,创新不应是一个或一伙专家在屋里冥想,而应在群众的实践中寻找解决矛盾的答案。特殊地讲,社会保险制度创新,不应是一味增加政府的保障责任,而应动员起社会各方面资源共同参与。比如,“十三五”规划提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应对老龄化趋势的必要制度创新,各方面正在讨论,社会期待甚高,汲取多年经验,我们一定不要把它搞成政府全包的老年护理制度,而要设计成高度包容性的制度,在人力、技术、组织、资金等方面,尽可能充分利用社会、家庭、个人等各种资源,政府予以适当支持和引导——对特定群体给予照顾护理费用的定额补贴,补助对护理人员职业培训,组织青年开展社会服务,以社会保险方式筹集资金定向使用,并以商业保险方式满足更多服务需求,重点放在家庭、社区照护而非服务机构等。总之,动员公众参与制度创新,需要更大的智慧。

其三,社保创新要重视新技术的应用。社保与新技术结合的创新系统,大体经历3个阶段或形态:一是跟从,将信息技术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即变手工操作为电子化操作,这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做到了。二是引领,信息化催生了新的公共管理理念和方式,推动了政策优化、体制变革和流程再造,这在许多地区开始实现,最典型的例证是9亿张统一社保卡卡的发放使用及其后台全国联网信息系统的建设。三是融合,社保信息超越公共管理的使用界限,与社会资源、市场需求高度融合,彼此交流,发挥出倍增效应。最典型的如,个人社保信息作为金融机构重要征信凭证;海量医保信息对观察疾病谱变化、药品及医疗器械研发、健康保险精算都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这需要在国家层面,各领域合作推进,应作为“十三五”社保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执行副总裁王和: 认知革命将引发传统保险“改朝换代”

如果说风险管理的本质是认知,那么,在认知革命到来的时代,保险需要认真思考“如何面对”的命题。

一项全球调查表明,98%的保险业高管认为,“认知计算”将会在保险行业中扮演颠覆性角色。

如果我们认同认知科学领域的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风险管理、改变保险,那么,我们不妨从“我”,即人类生命个体去观察并思考这个问题。

21世纪属于生命科学,而生命科学的本质属于计算科学。就生命认知而言,需要从分子生物学、医学影像学和穿戴式设备(动态生命记录)3个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观察和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接近生命的“真实”。



王和

保险需要高度关注分子生物学发展带来的新技术,如CAR-T技术就给了肿瘤治疗以全新的解决方案,而类似的创新与突破将层出不穷。

分子生物学、影像医学和穿戴式设备将从根本上改变医疗和健康管理,并催生精准医疗和自我管理,而这一切将对传统人身保险,特别是健康保险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群体”和“个体”两个维度。

从“群体”的角度看,科技进步和健康管理意识觉醒将共同推动生命质量的提升,继而改变生命的“长度”,因此,长寿风险是必然。长寿风险无疑将成为社会管理、社会保障体系和人身保险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这种风险的“长尾”特征应当引起高度关注,需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以避免不可逆的系统性风险。

生命数据维度的极大丰富,特别是神经网络技术的出现与应用,为解释生命,特别是疾病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全新的可能,使得保险定价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精算时代”。

生命数据的实时性将为动态观察提供可能,同时,“环境是影响健康的关键因素”已成为共识,因此,生命环境的“日新月异”也需要“生命表”的与时俱进,全息和动态“生命表”呼之欲出,同时,挑战了人身保险的定价基础及其稳定性。

从“个体”的角度看,分子生物学和医学影像学的进步,将挑战并改写传统认识下的“可能”,焦点将集中在疾病的发现与诊断、治疗的技术、方法与药物以及成本。

就保险而言,首先,影响的是“风险”,即发病率,而发病率的变化更多的不是由于“存在”,而是基于“发现”,即发现(诊断)能力的提升。因此,如何理解和判断,如何利用和管理,挑战了传统认识,也包括精算的基础。同时,风险的“新发现”,无疑将为保险创造新机遇。其次,临床医学的一次次革命性进步,将改写人类与病魔的关系,也改变人们对于疾病风险的传统认识,“不治之症”将被重新定义。同时,相关领域的“概率”变化无疑将影响保险经营的基础。第三,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科技带来新可能的同时,也面临着“新成本”问题,且是巨额的成本,个体往往难以单独承担,因此,迫切需要通过保险机制实现自我积累和社会互助。

面向未来,保险,尤其是重大疾病保险在面临空前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经营技术层面的问题,如精算、核保和理赔等固然重要,而经营模式层面的调整与变革则更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对于新技术带来的生命和健康管理意识和能力变化的洞察,因此,文化与理念是前提和基础,“生命关照”将成为这一切的魂魄所在。

传统保险精算是从“果”的视角,通过归因分析,去探究生命“因”的存在,去回答“为什么”,但这种回答更多的是一种具有主观和“大类”色彩的“猜测”,甚至可能陷入统计学的“绞肉机”。

生命科学则是从基本和微观层面,去客观地发现、观察和解释生命“因”的存在与规律,去回答“是什么”。

生命范畴的认知革命,无疑将引发传统保险的“改朝换代”。

###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 新形势下协同推进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从制度架构来看,基本保障社会化,补充保障市场化、托底扶助财政化的思路已经确立,我们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已经实现了制度上的全覆盖;在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的前提下,社保基



孙祁祥

金的结余规模也在逐步扩大。

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起来以后”的节点上,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弥补短板,全力寻求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必须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经济体系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从协调发展对象来看,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协调、要与人口结构相协调、要与区域结构相协调、要与城乡结构相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趋势,也为社会保障制度协调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总体来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距离“协调发展”的理想目标仍然存在缺口。表现为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基本适应,但成本高昂,威胁到经济增长潜力;社会保障难以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发展态势,人口抚养负担正逐步增加;社会保障难以缓解区域失衡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滞后,导致市民化滞后于城镇化。

要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协调发展,需要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有清醒的认识,并有科学的发展理念。

首先,要建立社会保障的“底线思维”。不管外部条件如何变化,社会保障的核心目标不能动摇,即社会保障要致力于解决保障社会成员获得整个生命周期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帮助儿童及其家庭突破生活中的恶性循环并切断贫穷的代际传递,强化健康服务和能力投资,以保持社保制度的自适应。

其次,要做好“分段走”的准备。面对广泛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要推进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能“齐步走”、“一刀切”,难以毕其功于一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采取了“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思路,先建章立制,扩大覆盖面,再逐步完善制度细节,提升运行效率。虽然这种做法因为与传统体制藕断丝连,从而加剧了利益格局进一步固化的风险,但也有利于降低摩擦成本。未来发展,可能仍需考虑各地差异,既要通盘考虑,也要兼顾各地特点,逐步推进改革。

再者,实现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协调发展。社会保障的协调发展,不能只是人为地去调和、平均,不能只追求共性和均一。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得是否成功,要看二者是否可以形成正反馈循环。要把把握好“看得见的手”人为干预的程度,不能妨碍“看不见的手”正常机能的发挥。政府和市场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和缺陷,它们的发展起点不统一,发展速度也是不平衡的,仅从各展所长角度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必定有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不可能维持不变。通常不是在“完美的市场”与“不完美的政府”之间选择,也不是在“不完美的市场”与“不完美的政府”之间进行选择。

最后,需要“中国特色理论”支撑。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过程中开始建立的,其建立过程意味着要放弃原有的国家保险体系,向下调整保障水平以便为改革提供便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决定了国际经验不能直接用于中国。作为一个快速进入老龄社会的人口大国,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要协同推进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我们必须摸索出一套中国理论来服务改革。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宫伟整理报道,本版图片由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提供。)